

吉林大学“东北亚区域政治、经济、历史与社会发展”
“十五”期间“211工程”重点学科建设项目系列著作

刘雪莲 许琳 ◆ 著

中国东北亚地缘战略研究

ZGDBYDYZLYJ

吉林人民出版社

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基地 211 工程项目

中国东北亚地缘 战略研究

刘雪莲 许琳 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总 序

献给读者的这套由19部专著构成的系列著作，是吉林大学“十五”“211工程”重点学科建设项目——东北亚区域政治、经济、历史与社会发展的标志性成果。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出现了许多新变化。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已经成为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最主要两大趋势：一方面，随着冷战体制和东西方两大阵营对垒的终结，经济全球化日趋增强；另一方面，随着各国越来越重视区域合作在维护地区和平与促进地区共同繁荣方面的重要作用，各种区域合作组织不断建立，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日趋加快。

冷战体制结束以来，东北亚地区局势出现了缓和。包括中国、朝鲜、韩国、蒙古、俄罗斯、日本在内的东北亚各国间关系，不论是在政治领域还是在经济领域都得到了很大发展，以有关国家地方政府间合作为主的东北亚区域合作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然而，与世界其它许多地区相比，东北亚地区的区域合作仍处于较低水平上，主要领域的合作没有取得根本性突破，深化合作还面临着许多严峻挑战。影响东北亚区域合作的因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由于该地区在冷战时期是大国矛盾的焦点地区，冷战体制后遗留问题较多，受冷战思维影响较严重，不仅地区内各国之间还没有完全确立互信机制，而且区域外的大国不断插手东北亚事务，进一步加剧了地区局势的紧张气氛；第二，该地区一些国家之间存在着复杂的领土、领海争端，并且这种争端已经成为影响有关国家间正常关系和地区稳定的重要因素；第三，日本的右翼势力极力否认对外侵

略的历史罪行和给周边国家造成的历史灾难，甚至美化其侵略行为，结果招致深受其侵略灾难的各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并且已经成为阻碍有关国家双边关系发展和多边合作的最主要障碍之一；第四，该地区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悬殊，多种社会经济制度并存，历史文化传统复杂多样，各国间相互尊重与认同的基础还较为薄弱。在这种背景下，为了有效维护东北亚地区和平与稳定、推动区域合作不断走向深入、克服发展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学术界必须加深理论研究，这是一代学人的历史责任，也是我们出版这套系列著作的目的所在。

朝鲜、韩国、蒙古、俄罗斯、日本都是中国的周边国家，发展与这些国家的双边关系和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是中国的一贯外交政策。为了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与和平崛起，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了“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发展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基本原则，并确立了“富邻、睦邻、安邻”的基本政策取向。上述基本原则和政策取向为我国全面发展与东北亚地区周边国家的双边关系和参与区域合作提供了有利的政策环境。近年来，我国实施了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的战略。中国东北振兴与东北亚区域合作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互动关系：一方面，中国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需要以东北亚地区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为保障，有效地参与东北亚区域合作是实现中国东北振兴的重要途径；另一方面，中国实施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为东北亚区域合作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新机遇。在这种情况下，迫切需要学术界对东北亚地区的政治、经济、历史与文化问题展开多学科的综合研究，这不仅有助于从理论上深入研究东北亚地区各种历史与现实问题，而且也为我国发展与周边国家双边关系和推动东北亚区域合作提供理论支持和决策依据。

吉林大学对东北亚问题的研究具有较长的历史。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就先后成立了有关日本、朝鲜、韩国及前苏联问题的专

门研究机构。为了适应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加强对东北亚地区国际问题多学科、多领域的研究，1988年成立了东北亚研究中心；为了进一步发挥已有优势和充分体现特色，加强综合研究，1994年在原东北亚研究中心的基础上，成立了实体性研究机构——东北亚研究院，并确立了对东北亚地区政治、经济、历史、文化、人口与资源环境等问题开展多学科、交叉性、综合性研究；1997年，由东北亚研究院牵头的“东北亚区域经济、历史与社会发展”项目，被国家批准为“九五”期间“211工程”重点学科建设项目；1999年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首批入选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04年，以东北亚研究院为主联合相关学科，又被国家列入“985二期工程”——东北亚研究与东北振兴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

在“九五”“211工程”重点学科建设项目圆满完成并顺利通过验收之后，2001年吉林大学“东北亚区域政治、经济、历史与社会发展”，被国家批准为“十五”期间“211工程”重点学科建设项目。五年来，在国家有关部门和学校的支持下，东北亚问题研究又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其中在项目团队的共同努力下完成的这套“211工程”重点学科建设项目系列著作，就是其代表性成果之一。这套系列著作的研究涵盖了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国际关系学、人口学等多个学科领域，是国内迄今为止有关东北亚问题涉猎的范围最广、规模最大的系列性最新研究成果，也是对国际问题开展多学科交叉研究的一种有益探索。希望这套系列著作的出版能够把东北亚问题的研究推向一个新阶段。

由于我们的水平有限，书中的论述如有不妥之处，诚恳地希望读者不吝指正。

王胜今

2006年3月16日

目 录

一、地缘政治的基本理论	(1)
(一) 马汉的“海权论”	(7)
(二) 麦金德的“陆权论”	(15)
(三) 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说”	(26)
二、中国的地缘状况分析	(32)
(一) 中国所处的地理位置及其特点	(33)
(二) 中国地缘环境的战略价值分析	(38)
(三) 东北亚在中国地缘战略中的地位与作用	(49)
三、中国在东北亚的总体战略	(69)
(一) 东北亚地区主义	(70)
(二) 中国的东北亚地缘政治战略	(83)
(三) 中国的东北亚地缘经济战略	(96)
四、中国与陆上大国的战略关系	(110)
(一) 中俄之间地缘关系的特点	(110)
(二) 中俄的安全战略关系及中国的战略考量	(121)
(三) 中俄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	(130)
(四) 中俄未来的地缘战略关系展望	(143)
五、中国与海上强国的战略关系	(152)
(一) 中日之间的地缘结构特征	(152)
(二) 中日战略关系中的美国因素	(157)
(三) 中日战略关系中的矛盾与问题	(166)

中国东北亚地缘战略研究

(四) 中日关系发展的地缘优势及其障碍	(183)
六、中国与边缘地带国家的战略关系	(196)
(一) 朝鲜半岛的独特地位及与中国的渊源关系	(197)
(二) 冷战后中国对朝鲜半岛国家的安全战略	(204)
(三) 朝核危机中的大国关系及中国的作用	(219)
(四) 中国与朝鲜半岛国家关系的未来发展	(244)
七、中国崛起与东北亚地缘战略选择	(258)
(一) 冷战后中国外交战略的新变化	(258)
(二) 大国崛起的地缘因素分析	(268)
(三) 中国崛起在东北亚地区的机遇与挑战	(282)
(四) 中国东北亚地缘战略的实施及其影响	(292)
主要参考文献	(312)
后记	(317)

一、地缘政治的基本理论

“地缘政治”这一名词，对国内的学者来说，也许并不陌生。它曾因在二战中被德国的纳粹党利用为其侵略扩张作理论依据而臭名昭著，也因此而名声远扬。但同时也应了中国的一句老话：“胜者王侯，败者贼。”当德国和日本的侵略战争遭到失败的时候，战败者所尊崇的学问也被世人所唾弃，被视为是“伪科学”，使它在二战后很长一段时期里销声匿迹。然而，正像不能因为原子弹被用作杀人的武器就抹杀其价值一样，地缘政治研究也不能因其被用来指导战争就无视甚至否定它理论的科学性。

实际上，地缘政治学的伪科学性就在于其法西斯主义的特殊内涵，而人们在概念上的简单混淆最终导致了普遍的误解。所以，在很长一段时期里，人们把地缘政治学等同于侵略扩张的理论，美国及其他国家的许多学者都曾武断地下结论认为：“地理学与政治学的任何结合都将导致战争和征服。”前苏联和我国的学者则将地缘政治学斥为“资产阶级的伪科学”，在学术研究领域根本没有它的立足之地。

关于地缘政治学有许多定义，大致可以归纳为三种。一是认为地缘政治学突出了地理与政治之间的关系，研究的是地理因素对政治现象和重大政治问题的制约性。二是指列强依据有关地理情况的分析而争夺世界或地区优势和权力的斗争，就是把国家间竞争、特别是全球性竞争的典型情况称为地缘政治学。三是把地缘政治学看作是外交政策的工具，它从地理决定论的原则出发规定外交政策的可能性和优先权。美国地缘政治学家斯派克曼曾写到：“地理是各国

外交政策中的最基本的因素，因为它最不可改变。部长们来去匆匆，甚至独裁者也要死，而山脉是始终不可动摇的。”在这一角度上，地缘政治学无论何时何地都不以存在于纯理论的东西为目标，而是以变成行为的指南为目标。如麦金德著名的三段论：谁控制了东欧，谁就可能控制世界的的心脏地带；谁控制了世界的心脏地带，谁就可能控制世界岛；谁控制了世界岛，谁就可能控制整个世界。麦金德的“陆权论”的地缘政治学理论就是为英国的对外战略服务的。我国很多学者也把地缘政治学看作是对外政策的工具。

地缘政治学，又被称为地理政治学，简称地政学。也有的学者把地缘政治学和地理政治学两个概念明确区分开，比如英国学者杰弗里·帕克所著的《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的中文译本，在书后的注中明确地把地理政治学和地缘政治学区别开，认为地理政治学是关于国家的地理空间现象的研究，旨在探求对国家实力之地理基础的认识，对国家行为的观察检验是以领土、区位、资源、人口分布、经济活动及政治结构这样一些特征为背景的。各个国家被当作世界政治空间的一个组成部分，并由国际关系所致的地理格局构成地理政治学研究的主要内容。而地缘政治学则专指纳粹时期德国所主张的把国家视为地理上的有机体和空间的特定现象来进行研究的科学。在纳粹时期，地缘政治学被错误地作为国家政策的工具加以滥用，而且被用于德国在欧洲称雄进行辩解。但是，在大多数学者的论述里，两个概念是混同使用的，不做明确区分。认为地缘政治学和地理政治学一样，中心议题都是研究国家与地理环境的关系，研究地理环境对国家政治行为、特别是对外政策以及国际关系的制约。

在西方有关地缘政治学的著作中，还提到一个概念，就是政治地理学。政治地理学的概念内涵比地缘政治学的内涵范围要广。政治地理学研究的对象锁定在地理与政治的关系方面，它最初仅限于国内政治的研究方面，主要研究自然的地理环境对人类生存活动特

一、地缘政治的基本理论

别是人类的政治观念和政治行为的影响。并以此作为国家划分政治区域的重要依据。后来,政治地理学的研究才逐步扩展到国际关系、国际政治领域中。而地缘政治学主要是以国家为基本单位、在国际范围内来研究地理环境与各国政治之间的关系的。因此,过去曾有一种广为流行的观点认为,地缘政治学与政治地理学的差别反映的就是外交政策与国内政策的差别:“政治地理学一般被定义为关于任何地理空间——国家、地区、省、州、选举区等内部地域政治力量对比的科学……而地缘政治学则与空间地理单位——国家、地区、大陆之间的关系相联系。”^①

关于地缘政治学的概念问题,许多学者都提出过见解。美国地缘政治学家索尔·科恩(Saul Cohen)认为,“地缘政治分析的本质在于国际政治权力与地理环境的关系”。^②法国著名政治学家雷蒙·阿隆(Raymond Aron)认为,地缘政治学研究的主要内容是“把外交—战略关系与对资源作出的地理—经济分析以及由于生活方式和环境(定居、游牧、农业和航海)而引起的对外交态度的解释,从地理的角度加以系统化”。^③俄罗斯学者拉祖瓦耶夫认为,“作为一门科学,它主要在于研究国际关系和多半是保障国家安全背景下的外交政策的空间逻辑。”^④

总之,概括起来说,地缘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就是地理环境对于国际政治、国际关系以及各国的对外政治行为的影响。它所强调的是对象的国际性质。不过,地缘政治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在今天

① N·B·波诺马廖娃:“对外政策的地缘政治学因素: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现代观”,《哲学问题》1990年第1期,第36、37页。转引自〔俄〕齐甘科夫:“地缘政治学:理性的最后避难所”,《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5年4期。

② 〔英〕索尔·科恩:《分裂世界中的地理与政治》,伦敦,麦杜恩出版公司1964年版,第23页。

③ 〔美〕雷蒙·阿隆:《和平与战争》,纽约,双日出版公司1966年英文版,第191页。

④ 转引自《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4年10期。

已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如果说以前的地缘政治学可以被看作是几个竞争大国之间关系的地图概念的话,那么现在这样说已经不够了。目前,新的国际现实要求国际社会要有新的行为。地球气候、动物群和植物群以及地表和空间环境的变化,所带来的不是某个国家的问题,而是全球性的问题,它需要国际社会的所有成员同心协力,来建立和发展赖以后代拯救文明的全球地缘政治学。正如美国学者克里斯托夫(L·Kristoff)所说:“现在地缘政治学家看地图,已经不是了解自然将什么强加于人,而是了解自然给人指出什么方向。”^①

二战以前,地缘政治学已发展为一个比较系统的学问。二战后一段时期处于停滞状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关于军事、战略或其它领域中地缘政治学观点的终结。一方面,地理环境对国际政治方面的制约仍然客观存在,这是不可否认的现实。另一方面,实际上各国的外交家、政治家和政府官员从来都没有因为地缘政治学的声名狼藉而放弃使用地缘政治学的分析方法。战后以来有哪一个大国的全球政治分析、国家政治战略的制定、外交政策的调整没有考虑到地缘政治的因素呢?因此,地缘政治学在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在西方又重新复兴起来,出现了斯皮克曼等研究并发展地缘政治学的学者,在学术界也开始频繁出现“地缘政治”、“地缘战略”等词汇。而在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地缘政治学在八十年代以后才得以复兴。

近些年来,有关地缘政治学的理论研究在中国学术界开始兴起,但是,同时对地缘政治学持否定态度的思想观点也时时出现。一些学者认为,随着全球化趋势的日渐加强,地理环境对国际政治的影响作用已微乎其微,因为所谓全球化就是经济、政治乃至思想文化

^① 转引自〔俄〕齐甘科夫:“地缘政治学:理性的最后避难所”,《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5年4期。

一、地缘政治的基本理论

等各个领域超越国家界限和时空界限的发展，交通工具的发达，信息通讯技术的进步，特别是信息高速公路的建立，完全可以改变来自地理因素的制约关系，使这种制约可以忽略不计。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土地与知识是人类社会发展和国际格局演变最本源的两大因素，而争夺和控制土地是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国际斗争的核心内容，在信息社会，知识成为中心资源，并将超越土地的作用。因而，土地的主导性使命终将结束，地缘政治将衰落于信息社会，日渐为智缘政治所取代。^①

地缘政治的研究，从其理论的立论上来看，就是抓住了“人与自然环境”的联系链条来锁定理论的研究范畴的。作为人类，它必然生存在一定的地缘空间之中，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联系是永久存在的，因而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总会有一定的影响和制约。但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是一成不变的，人改造自然的能力在不断地提高，人对自然的认识也在不断地升华，因而，地缘政治的观点也应随着人类改造和认识自然能力的变化而有所改变，以使理论适应时代的发展而发展，这也是理论的生命力所在。

冷战结束以后，地缘政治观念实际上并没有消失，而是以一个新的姿态出现在国际政治中，甚至在某些时候又显得十分流行。正如1985年英国出版的《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一书中这样写到：“地理政治的”这个字眼儿，近年来无论在政治家当中还是在学界同仁或新闻记者当中都已经显得十分流行了。仿佛就在一夜之间什么东西都带上了“地理政治的”标准，人们似乎突然发现各种国家事务中都存在地理因素的作用。比如，它使人联想到波斯湾的石油供给、分布不均的战略矿产、各大陆的农业潜力、险要的海上通道、猝不及防的前沿地带、日益减少的自然资源等等。^②可以说，

① 张蔚斌、马磊：“地缘政治与智缘政治”，《世界经济与政治》1998年第8期。

② 参见王逸舟：《当代国际政治析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8月版，第178页。

即使在冷战结束以后的今天，麦金德的著名三段式警句还仍然回响在某些国家的政治家的耳畔：谁统治东欧谁便控制心脏地带；谁统治心脏地带谁便控制世界岛；谁统治世界岛谁便控制整个世界。被麦金德所称为“世界岛”的欧洲、亚洲、乃至非洲大陆的重要地区仍然是一些国家的必争之地。

综上所述，在全球化发展的形势下，在科学技术不断进步的今天，地理环境对国际政治的影响依然存在，并时时显示出其重要性。摩根索在谈到国家权力的要素时，将地理要素列在第一位，并指出：“一国权力所依赖的最稳定的因素显然是地理。”^① 在分析国际政治的过程中，我们既不能夸大地理因素的作用，也不能对地理因素置之不理，忽视它的影响力。对地缘政治学理论，既不能完全抛弃，也不能抱守残缺，而要新的时代中，用新的观念去充实它，发展它。

研究中国的东北亚地缘战略，离不开地缘政治学理论的指导。东北亚地区是冷战后在国际社会倍受注目的区域。这一区域包括了中国、日本、俄罗斯、蒙古、北朝鲜和南朝鲜等六国，这些国家在国家力量、意识形态、历史传统等各个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异，构成了这一地区复杂的国家关系。而从地缘环境类型的角度来看，东北亚地区也是多元的，既有中国、俄罗斯、蒙古等大陆型国家^②，也有日本这样的海洋型国家，还有南北朝鲜这样的边缘地带的国家，可以说囊括了世界主要的地缘类型，而且这一地区在二战后一直没有脱离美国的影响，使这一地区的地缘环境进一步复杂化。

从地缘角度研究中国的东北亚战略就必须对这一地区所存在的地缘环境及其影响进行理论上的分析，这种分析可以从地缘政治的

① [美] 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1990 年 12 月版，第 152 页。

② 中国因为有漫长的海岸线和出海口也可称其为海洋型国家，但是，长期以来由于中国基本上采取的是内陆型的发展模式，因而仍然把它看作是大陆型国家。

几个相关理论入手。

(一) 马汉的“海权论”

马汉 Manhan, Alfred Thayer (1840, 11, 27—1914, 12, 17) 是美国历史上著名的海军战略家及历史学家。他曾在海军服役 40 年，是海上力量的早期倡导者。1856 年他在当时美国最高海军学府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就读，毕业后，以海军中尉的身份参加了南北战争。1884 年接受新建的海战学院院长斯蒂芬·鲁斯将军的聘请，在该院讲授海军史和海上战术课程，不久，接替鲁斯担任院长，1896 年退休，专门从事写作。1902 年，他担任美国历史协会主席，并继续与美国海军界保持联系。鉴于其功绩，美国海军授予他海军少将军衔。1914 年，空前惨烈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同年 12 月 1 日，马汉将军与世长辞。

1890 年马汉根据其授课讲义整理的《1660—1783 年间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一书正式提出被西方资产阶级奉为经典的“海权”理论。此书与他后来的《1793—1812 年间海权对法国革命和帝国的影响》及《纳尔逊生平——英国制海权的化身》一起构成了其“海权”理论的三部曲，这三部书被公认为是西方政治家和战略专家们的必读书目。

马汉海权论作为近代西方资产阶级军事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出现绝不是偶然的。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从自由走向垄断，一方面，国际垄断组织已经形成，在世界范围内大肆扩张，世界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几乎被瓜分完毕；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各国的发展又是极不平衡的，从而使它们在经济、政治上重新瓜分世界的斗争日益加剧，战争，尤其是海上战争就成为资本主义各国之间争夺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主要手段。美国作为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在独立战争后，经济飞速发展，到 19 世纪末，其工业总

产量已超过了欧洲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跃居世界首位。而随着生产的扩大，其资本积累已超出国内市场需求，资本扩张的本性客观上要求美国政府结束孤立主义政策，大力发展国际贸易，拓展海外市场，以解决国内生产过剩所引发的严重问题。

而在19世纪中期，美国因忙于处理国内事务，没能参与这一时期西方列强对整个世界的瓜分。为了从其他列强手里分得一些殖民收益，美国一些具有战略眼光的学者和政治家建议美国放弃危险的孤立主义和军事上的软弱主义，向海外进行扩张，利用自身优越的条件确立其作为世界经济、军事和政治大国所应有的地位。美国东西被两洋环绕的地理特征决定了，唯一能将美国力量推向世界舞台的核心力量是建立一支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舰队。而当时，美国海军建设是非常落后的，直到19世纪70、80年代仍默默无闻，海军战斗力不仅难以与英、法等老牌列强相媲美，甚至不抵一些中小国家的海军，根本无法支持美国向海外扩张的需要，所以美国作为新兴的帝国主义国家要与老牌列强竞争，就必须迅速改变这种状况，马汉的海权论就是顺应这一需要应运而生的。

而到19世纪末期，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海军已从帆船时代进入铁甲蒸汽船时代，用于海战的武器装备水平大大提高，从而使海战在总体上发生了很大变化，客观上需要有一种系统的海军理论作为指导未来海战的依据。顺应这一时代需要，并在吸收前人经验的基础上，马汉对过去海上战争的经验进行了系统、全面的总结，创立了具有重大历史和现实意义的“海权论”。

以上两方面的现实需要决定了马汉的“海权论”的主要内容。从总体上看，其理论大致由两大部分组成：其一是强调民间商业航海及海军军事活动同国家利益及国际政治之间的联系。这部分是主要想解决十九世纪后期美国经济崛起所面临的财富与权力之间的关系问题，因此他把海洋扩张同国家商业活动联系在一起；其二是为确立、支撑和扩大国家海权而设计的一系列海上军事原则，作为指

导美国海军战略决策的理论基础，并为美国的外交和军事战略提供理论指导，这两部分在马汉眼里同等重要，且彼此相互依赖。

关于“海权”论的主要支撑框架，马汉认为是建立海军体系、运输体系和驻泊体系。认为国家要对海洋有强有力的控制权。只有建立强大的海军体系，才能实现国家海上的霸权。他阐述说，为了取得未来争霸战争的胜利，国家必须拥有强大的、能够取得海上统治地位的海军力量。只有具备了强大的海军，国家才能打破敌人的海上封锁，切断敌人的海上交通、摧毁敌人的舰队，从而夺得制海权。否则，这个国家就只能在国际政治中取得劣势。但是，在马汉的理论逻辑中，海权并不是仅仅指国家拥有强大的海军，还包括国家要拥有庞大的商船队，即建立庞大的商船运输体系。他讲，商业和贸易是一个国家赖以富强和发展的先决条件，国家对海洋的兴趣主要应表现为对海上运输和商业贸易的兴趣，而国家贸易的繁荣和强大又是与国家对海洋的控制密切相连的，“对海洋进行控制意味着在世界上占重要影响力，……也是构成国家安全和繁荣的诸物质因素中的主要因素”。^① 海军舰队应和商船队相辅相成，构成国家海上力量的重要内容。马汉还指出，建立广泛的驻泊体系也是“海权”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一个国家的商船队和舰队在向海外扩张时，必须拥有海外殖民地和海军基地作为上述船只在海外停泊、交易、补给、避风和维修的据点，否则，“好比陆地上的鸟儿，不能飞出离岸边很远的地方”。^② 据此可断，海军体系，商船运输体系和驻泊体系构成马汉“海权”理论的三个重要连环。

可想而知，任何国家尤其海洋国家在原则上都渴望发展各自的

① [美] 马汉：“夏威夷与我们未来的力量”（1893），载马汉：《现代与未来：美国对海上力量的利害关系》（1897）纽约，肯尼卡特出版社1970年版，第52页；第31~32页。

② [美] 马汉：《1660-1783年间海上力量对历史的影响》波士顿：利特尔与布朗出版公司1900年版，第40~41页。

海权，然而，历史证明，只有少数国家才能实现这一点。为说明这种状况，马汉以早期西班牙、法国、荷兰、英国及美国的具体史例为证，列举了影响海权的六个基本条件，第一是地理位置，马汉认为如果一个国家所处地理位置既易于进攻又便于通往公海，还可以控制世界贸易的主要通道，那么，这个国家在获得海权方面就具备了极其优越的条件。第二是自然结构（包括与此相关联的自然环境和气候），马汉认为，一个国家要想获得海权，不仅要有绵长的海岸线及众多的天然港，而且还要建设良港和海岸基地，便于海上军事力量的建立和发展。第三是领土范围，马汉认为，发展海权不仅在于国家海岸线的长度及港口特征，而且还在于国家版图的大小。第四是人口数量，认为国家要想成为海上力量，还必须拥有充足的人口，尤其要具有众多从事与航海业有关的人口。第五是民族特征，他讲如果人民有热爱经商的天性，并想通过发展海外商业贸易的途径来致富，那么这个国家就有可能成为海权国，第六是政府性质，它包括国家的制度。马汉指出，政府性质对国家的影响有两个相互区别但又密切相联的途径。在和平时期，政府推动人民勤俭致富或鼓励他们寻求冒险向海洋获取财富，而在战时，政府则要运用相当规模的海军以保护本国商业船只在海外的贸易活动。^① 细观上述六个条件，大致可以归纳为两大类：前三个条件是自然地理方面的，而后三个条件则是人文方面的。这六个条件为后来以汉斯·摩根索为代表的国际关系现实主义学派定义权力要素内容确立了基本框架。在这六项条件中，马汉认为其中地理位置的作用最大，为说明这一点，他拿英国的历史作例证：英国与欧洲大陆的距离适中，这样既可以使它相对免于入侵的威胁，又可以使它对陆上潜在的敌人实施有效的攻击，同时英国的舰队也可以从其战略基地方便地集结以进

① [美] 马汉：《1660-1783年间海上力量对历史的影响》波士顿：利特尔与布朗出版公司1900年版，第28-89页。